

◀ (上接2版)

也逐步加深，在孟买成立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China）等先后在上海开设分支机构，在孟买和上海之间进行汇兑和资金业务。1864年，大英轮船公司、帕西人、沙逊家族等共同发起汇丰银行（HSBC），使上海和孟买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同一阶段，来自印度的粗纺产品大量输入中国，冲击着江南经济——一方面成为丝绸等原材料输出地，另一方面也是制成品的大量输入地。

和孟买一样，上海开埠之后无论人口数量还是国际移民都急剧增多，根据统计到1905年的数据，世界各国在上海的洋人多达10875人。这些洋人带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自孟买的影响也非常明显，譬如上海的好几条道路名字都是印度的城市，上海滩的英文名（the Bund）来自帕西族首先使用的印地语（the Bundh）。英国殖民者带来的锡克族士兵被上海人颇带调侃地称呼为“红头阿三”。更重要的是，洋人还用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打造自己的聚居区，沙逊家族为代表的塞法迪犹太人社群仿照孟买的Fort在外滩和南京西路建造了一系列的欧式建筑和马路。法国人建起林荫大道，道路两旁是在法式梧桐的隐蔽下散落的高档咖啡馆。上海的城市功能、建筑和文化氛围变得与孟买多少类似，呈现出明显的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氛围。

同呼吸共命运

显然，孟买和上海的近代城市文明都和殖民者带来的先进技术、基础设施和市场经验有关，最开始，主体民族对这种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参与异常有限。然而，孟买和上海并没有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探索。

以沙逊家族为代表的犹太人和塔塔家族为代表的帕西人引领了孟买的现代化潮流。沙逊家族在19世纪晚期开始投资纺织厂，并以超出想象的低廉价格雇佣了大量

孟买腹地的印度人，通过市场竞争击垮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导致兰开夏郡数千人失业。差不多同时，塔塔家族创始人Jamsetji Nusserwanji Tata前往兰开夏郡考察。他被现代纺织工厂的高效和地狱般的工作环境所震撼。为此，他定下三个终生奋斗的目标：建立一所钢铁厂（Tata Steel）、一座发电厂和一所世界级的科研机构（Tata Institute）。1877年，塔塔的女皇纺织厂投产，随后又在孟买设立了斯瓦德希纺织厂。无论犹太人还是帕西人都从最初英国-印度本土之间的经纪人（买办）转变成贸易商，进而向制造商转变，这符合全球工业革命发展大趋势。1911年塔塔公司开办了印度第一家钢铁工厂，重工业由此起步。

上海工业化进程则比孟买晚了数十年。尽管洋务运动建设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工业项目，然而《马关条约》之后，上海才开始允许外商投资纺织、房地产等制造业。借助贸易积累了巨额资本以及一些特权，瑞记、怡和等洋行直接投资丝绸厂、纺织厂等，沙逊洋行通过金融机构间接投资船坞、饮料、啤酒等工业企业，上海制造业突飞猛进，而华商也开始积极参与投资。凭借成本低廉的水路运输，上海获得来自远方的工业原料，卓有成效地与其他工业制造中心竞争。这时上海仍然以轻纺加工业为主，重工业比例仍然极少。然而1930年的上海，现代产业工人已占全国43%，生产总值占全国51%，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首要的工业中心，且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一个垄断性大型制造企业。自那时起上海也成为品牌和质量的代名词。这个阶段房地产也成为投资重点，新沙逊洋行在外滩新建了一系列的高层建筑，而同样来自孟买的哈同洋行、安利洋行等大量投资今南京路、淮海中路和长乐路，显著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

尽管孟买和上海都是在帝国强迫下被打开门户，并成为区域最重要的门户城市，但门户城市的功能使其获得了丰富的资本，为城市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进而牢固确立了一种工业化、城市化的思维模式和心态，成为引领各自国家走向世界的“排头兵”、“先行者”。

这两座先进的城市大胆尝试着将贫困落后地区拖拽



→塔塔家族
创始人
Jamsetji
Nusserwanji
Tata

←柯棣华,1938年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



进现代世界，展现出无穷的创造性，也体验了全新的管理国家和经济的方式方法，孕育了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异常振奋人心的条件。这条路线从一开始就酝酿着革命性。二战前夕，孟买已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核心阵地和先锋。经济上的成功使帕西人逐步演化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组成部分，成为独立运动的重要支持者，且最终构建了现代印度最大的尼赫鲁-甘地政治家族。1942年，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孟买做出决定：动员所有力量，开展最广泛的不服从运动，实现要英国退出的目标。这份决议最终使印度在1947年实现独立。上海的工业化也哺育了工人阶级的快速成长，加上民主和科学理念的广泛传播，最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好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民族先锋队的领导下，新中国最终摆脱半殖民地的困境，重新屹立于欧亚大陆的东部。

即使在独立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动荡年代，上海和孟买在追求工业化和各自民族前途命运的征程中也总是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给予彼此最温暖的支持。1904年塔塔家族的远亲Bejan Tata接受塔塔总部派遣，从孟买来上海，展示了与家族姓名相称的才干，经营获得巨大成功，积累了雄厚的财富。在富有的帕西人、信德教徒的带领下，一些驻沪的印度人发起支持印度独立运动的协会和组织，并主动捐赠资金和实物。彼时中国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都给予强烈的道义和政治支持。当

印度获得独立时，塔塔等在上海的印度人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来临，而英国驻沪领馆以他们是印度人为由，拒绝为他们延长护照有效期。沙逊家族等犹太人也感受到印度独立运动对商贸、投资和资金业务的影响，从1920年起逐步将经营中心从孟买转移到上海，最终总部也迁移过来。1930年代，印度国大党也转变了早期对鸦片贸易的支持态度，尼赫鲁等人组织了包括来自孟买的柯棣华医生在内的援华医疗队，这最终成为中印关系最值得纪念的友好篇章。

历史总是充满惊喜，1940年代，Bejan Tata出生大于上海的孩子Sam Tata再度来到孟买时，遇到了世界著名摄影大师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此后一直追随布列松并与其一起记录了1946到1948年间的印度独立运动，尤其是甘地的遇刺。1948年，他又回到上海，真实记录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上海的经过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当时的上海财政局长顾准要求外国殖民者全盘撤离的全过程。这样，塔塔成为上海和孟买交往最直接的参与者，也是最好的见证者。

如何“对标”

随着中国、印度的各自独立，上海和孟买迈向新的历史征程。作为各自国家的重要城市，政治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不再是核心任务，

如何高效发挥自身工业化和现代化引擎，驱动国家现代化，成为重中之重。

当上海通过改革开放再度崛起时，孟买已不复当年大英帝国光环下的辉煌。上海生活水准令人羡慕，城市功能高效运转。当年的沙逊大厦成了迎接世界各地客人的和平饭店。塔塔集团也再次回到上海，更有近万印度人在上海生活学习和工作。目前，上海更积极对标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顶尖城市，追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经济密度和投入产出效率。孟买也在追求成为世界级城市，尽管没有着眼于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却仍然诉求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生活水准和有活力的经济。从世界主要城市排名的主要指标看，上海都要好于孟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设在了上海而非孟买。这一切似乎与19世纪孟买引领亚洲风骚、上海被动响应的状况刚好相反。当今的上海能给孟买的启示、借鉴、经验和教训，似乎远比孟买能够给予上海的要多。

看到上述差距，孟买的上层决策者试图全面革新。2003年，工商业智库组织“孟买第一”（Mumbai First）和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曾公布了一份《孟买愿景：将孟买转型成为世界级城市》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孟买要和上海这样的全球大都市相媲美并在2013年建成世界级城市，就必须改变自身的精神状态。2004年印度前

(下转4版) ➔